宫廷肖像画中的规范和现实主义

——一幅杰出的十七世纪中国肖像画

戴维·基德著　　赵世瑜　节译

在我们对康熙初年的政治史加以研究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条史料："先是辅政时，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清史列传》"遏必隆"）。但索尼究竟有多老呢？不仅索尼，而且其他三位辅臣的生年在现存官书中都难以寻觅。英国《东方艺术》杂志第19卷1973年第4期中发表的戴维·基德研究索尼肖像一文和索尼肖像的照片，有助于我们搞清索尼的生卒年代和显赫地位。同时，也启示我们去注意宫廷绘画这一方面的资料。下面谨节译此文的有关部分。

——**译者按**

西方学者对中国宫廷肖像画艺术注意甚少，主要是因为在北京宫廷收藏以外，几乎不存在这一极神圣的和皇家艺术的范例。

最近在日本发现的一幅绘于清初的满族贵族的官方宫廷肖像使我们有可能对这儿无所知的宫廷肖像画艺术的杰作加以第一手的和细节的研究。由于绘制日期在1655年，即顺治（清朝第一个皇帝）十二年，这幅肖像就不仅显示了清初，而且显示了晚明艺术家的工作。

此画的巨大尺寸，对现实主义的强调，以及充满活力的气氛，立即把这幅肖像与那些西方人熟知的、不怎么出色的"祖先像"区分开来。由于它的尺寸是约长十二英尺和宽六点五英尺，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绘画之一。甚至这幅画本身是在八又四分之一英尺长、五又三分之一英尺宽的一整块丝绸上绘制的。

京都国家博物馆的前裱画师和修复师重平下村（Shigehira Shimomura之译音）先生慷慨地提供了关于此画及其装祯的技术资料。他认为明清两朝禁止奢费的法律也许限制了为绘画织造的这种尺寸的整块丝绸专为宫廷之用。此画的最初装裱是由两块分开的绸缎材料——一块蓝色、一块米色——所制成，但这两块料子上都有同样的连锁卐字图案。在对定缎销钉的形状加以观察的基础上，下村先生指出，现已遗失的原配轴头是玉的。

正好位于这一巨幅丝绸中间的，衣着富丽的人物形象被描画为几乎是真人的两倍。他身着礼仪朝服，两腿叉开坐在宫廷风格地毯上的虎皮漆椅上。他似乎仅仅半披着那富丽的金线罩袍，这种在闪亮的蓝底上有特有五彩祥云和四爪金龙的典型清廷服装表示着内阁大臣的宫廷品级。还有那天青石的和象牙色的朝仪项链，他右手拇指上的玉搬指，有红色流苏的黑貂皮帽，珍珠镶嵌、金丝装饰的塔形帽顶，红宝石顶戴和轻巧的单眼花翎也都是如此。缎服里面的巨大黑貂皮袍、黑貂皮披肩、水獭皮边袖子及其宝剑则表示着一个武将的官阶。一个烟草袋和一个烟斗盒分别挂在一条由一个宝石钩子别着的暗蓝色镶边腰带的左右。这件绣龙缎

缎织品也许在确定清初宫廷服饰的时间方面会证明是有用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肖像外衬的标签上的题字。这标签是从与具有连锁卐字图案的裱绫本身相同的米色绸缎上裁下来的。那题字是："辅政大臣索，五十五岁，水獭皮边领袖朝服。顺治十二年奉上钦赐"。①那压倒一切的富丽、规格，以及制作此画的巨大花费，加上这幸运的题字，可以指出它正是来自宫禁而不是别处。

这个被清朝第一位皇帝如此眷宠的人是谁呢？我们在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中只找到一个在1655年有可能是五十五岁、担任过辅臣职务的姓索的人。②这是一个满人，索尼，直到1651年，他曾主要作为一名宫廷学士，但也参加了许多次军事战役（从而有水獭皮袖头）。1651年，索尼突然晋升为伯爵，并被任命为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以此作为对他忠心支持彼时十四岁的小皇帝以反对试图在强有力的多尔衮死后包揽摄政的宫廷反对派的奖赏。索尼派取胜了，正如我们所知，他对胜利一方的忠诚通过五年后被赐画像而进一步得到奖励（附带说一下，恒慕义说索尼死于1667年，生年未详。这幅画则确定了他的生年为1599年或1600年，而他死时是六十七岁——这对一个既活跃于宫禁又驰骋于疆场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年纪了。③在他的晚年，索尼在伟大的康熙皇帝未成年时成为帝国的四位辅臣之一。

当然，这幅画是否真地在宫廷中挂过还属猜测，尽管说它至少在下令画它的顺治皇帝时期在宫中挂过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该画的绘制似乎是为了即使短期地悬挂在宫中某处，然后也许再赐与辅臣索尼以供死后悬挂在他自己家里的宗祠以供瞻仰。不管怎样，这幅本身长十二英尺的画还必须再高过所需祭台（至少三英尺高）三英尺，换句话说，为了正确地展出这幅画，一间有约二十英尺高墙的屋子是必要的。甚至画的裱衬的比例也证实了它的巨大高度和希望看到它所需的距离。一般中国画的天头长度大约是地头的两两，而这幅索尼像的天头则增加到地头长度的几乎三倍，以补足它悬挂所需的高度。下村先生告诉我们，经过他手画的正常规格，最多是裱三层纸，而这幅肖像裱了五层纸。

设想一旦索尼光荣的时光流逝这肖像依旧留在宫廷，它就与其它类似的王朝"文献"一道，也许在宫禁中收藏官员肖像的南薰殿中占有一席之地。④这些画的大多数、当然还有清以前各代的画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尽管没有任何记录说这幅索尼像是如何流入日本的，它仍有可能是义和团暴动时被掠来的，也可能是1911年清朝灭亡后被太监买出的，或甚至是1936年以后日本在北平占领军的什么人从宫中搬走的。另一方面，如果肖像曾赐与索尼家，它可能是在1911年以后任何时候被卖出或抢走的，无论如何，这肖像曾在日本挂过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那儿没有什么建筑能容纳这样长的画。

尽管它的封套年久破旧，此画近乎完好的状况证明它虽已存在了近三百年，却甚至很少打开过。右侧的水锈是新近染上的，它是立置在潮湿地板上的结果，因为它太大了，无法平放在一般的架上。我们宁肯认为，是这幅画不可思议的性能使得索尼本人染上锈迹的。

我们当然可以肯定，索尼从未坐下来画过像。他的实际出场可能只是被要求单单画下面部，然后再被移到画像上去。这幅画的大多数其它细部——他的帽子和满洲贵族的项链，他的大缎靴，他的罩袍和腰带，椅子和地毯——是由传统规定的，如那题字所指出，艺术家只需被告知索尼的官阶和他朝服的名字，除了面部，画家甚至可以不问是谁就能完成这幅画像。这样看起来，标签上的题字不仅可以理解为对这幅画的说明，而且是给艺术家的指示。

一个更有意思的细部是挂在索尼腰带右侧的烟草袋，以及左侧那装在盒里的烟斗，这东西的顶部刚刚看得见。或是索尼自己抽烟，或是至少把他描绘成赶时髦的人，因为那时烟草

还没引进中国多久。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规范绘画的一部分，这是近代含义的现实主义，它使我们感到奇怪，是否这烟草袋不象一般的，可替换的绘画道具，事实上不是索尼自己的和取自生活中的。

我们也一定不会不考虑到，我们在服装和附件的绘画中发现的某些创造性和现实主义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满族罩袍、异族情调的皮毛和帽子、珠子和花翎传入北京宫前不过十二年之久，这些东西在宫廷画家眼里还保留着新鲜味道，没有变成老一套。索尼舒适自在地坐着——他的头和肩膀重心微偏，重量较大地落在右胳膊上（这样一种姿势对祖宗像中一般都是严格的对称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实际上，顺治十二年，满人还在为夺取他们对中华帝国的控制拚杀，可以肯定，宫廷和政府机器在他们手里，但并非整个国家。我们知道，索尼是个武人，在这幅肖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值壮年，他对随便但又合适地披着朝服感到不耐烦，急于去来从事使那些还未停止战斗的民族顺从他和他的皇上的意愿的活动。

丰满的，近乎肉感嘴唇并不仅仅被画出来，而是嘴部基本的肌肉组织的三部分。尽管现在合着，这嘴唇也许刚刚还在蠕动，也许会再讲话，如果再讲话，我们听到的是不是满语？艺术家没有忽视索尼右颊上的两颗小黑痣，或是那不够英雄的胡须上的三十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并照他看见的画了下来供我们今天观赏。他描画了微微松垂的下颚，有垂肉的下巴和脖子表现出他对肉欲的缺点具有不顾一切的尊敬。

他眼皮下垂，左边显然不同于右边，同时眼睛周围的、眉毛边上的、特别是眉毛之间的肌肉紧皱着，好象索尼在五十五岁时也许看起来长途跋涉了许多平原，在严寒中长时间地纵马驰骋，而且比大多最人看到更多的抢掠和欺骗。我们全然了解象我们刚才那样做，象我们为了寻求它背后的启示而去读历史时所做那样，企图通过“读”其面部去找到活生生的人是一种陈旧的、并且有些拙劣的伎俩。他们说，也可以猜想索尼只是近视眼和需要一副好眼镜，而不是在冰天雪地里长途驰骋。由于这两种“读”法得无法证实，他们劝我说，最好是缄口不语。我们的意见是，如果合理利用，这种“伎俩”的有用性超过了把这儿没有的含义和启示硬塞进艺术和历史的危险性。无论索尼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在直觉的状态中再继续一小会儿），我们很想把它们读作一位丢掉幻想的勇敢和无情的人的眼睛。这幅肖像的存在正是因为索尼判断人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至今仍然冷冷地注视着我们，估价着我们精神的质量和我们能够得到信任的程度。

---

①引号内文字系按文中所附照片抄出，与原英文各不同.另此题字当为顺治十八年福临死后所题，因为彼时索尼才与鳌拜等三人一道被授辅政大臣.但为何画成数年才附标签则成题问，需进一步探检——译者.

②原文如此，系作者不了解满人姓氏习惯之误——译者.

③这里计算有误.因五十五岁是虚岁，1655年应是五十四岁，生率应是1601年——译者.

④查清胡敬撰《南熏殿图像考》及《国朝院画录》，未见著录此画——译者。